

蚊子館背後的現實真相

——記「台灣公共閒置設施抽樣踏查」行動

顧錚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攝影評論家

2010年秋天，台北。在台灣享有國際聲譽的藝術家、台北當代藝術中心代理理事長姚瑞中送我一本《海市蜃樓——台灣公共閒置設施抽樣踏查》。翻看之下就想寫點什麼，但因諸事忙亂而耽擱下來。2011年10月，他又寄來一本厚達667頁的《海市蜃樓II——台灣公共閒置設施抽樣踏查》，而先前的《海市蜃樓》則更多達683頁。接獲《海市蜃樓II》，方知他的這個抽樣踏查項目竟然再接再厲、步步深入。《海市蜃樓II》的腰封上這麼寫著「全台一百處『蚊子館』現場直擊／納稅人不能不知道的社會真相！」

如同兩書的副標題所示，《海市蜃樓》是「台灣公共閒置設施抽樣踏查」的匯總。行動的組織者與實施者，以及兩書的編者就是姚瑞中和LSD。此處的LSD是「失落社會檔案室」（Lost Society Document）的縮寫，湊巧與英文迷幻劑的縮寫相同。

走筆至此，先要為「蚊子館」作解釋，其指動用了來自納稅人的公帑所建造的公共設施（相當多數是以文化的名目建造），但往往因為沒有遊人或觀眾稀少，這些場館最後成為孳養蚊子的所在。

20多年來，台灣社會經歷了政黨輪替的巨大社會變動。兩黨政治的大格局之下，文化成為政治角力的籌碼，出於各種考慮（地方政治、內需經濟與選舉等），各方政客與民意代表以文化之名，頻開政治支票，希圖以此拉攏選民、拉動經濟，但這種花費鉅資的公共建設，同時也催生分贓政治等腐敗現象，而全島各地的「蚊子館」則成為了這種政治生態之下的具體文化「成果」。如文化評論家張鐵志所概括的：「假民粹主義、發展主義、地方金權政治，讓台灣人民繳稅養了這麼多蚊子館，這些金錢不是消失於空中，就是肥了政客與財團。」（《海市蜃樓II》，頁19）張鐵志更進而指出：「當民意代表不能代理人民監督公共資源的分配，而只是分贓集團的一員，當人民不能夠積極參與表達他們的需求與利益，這就是民主的潰敗。」（《海市蜃樓II》，頁19）

為了保衛社會與民主理念不遭輕侮與踐踏，不忍見以納稅人的「血稅」建成的「公共設施」投閒置散，藝術家姚瑞中發起調查行動，將調查結果昭示天下，並敦促政府整改。這種整改，具有將瀕死及死亡的場館加以啟動的目的，在台灣稱為「活性化」，簡為「活化」。

本是藝術獨行俠的姚瑞中，在調查工作中發現，以一己之力無從應付數量龐大的調查對象，於是發動他的學生全面參與。由於他在台北藝術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任教，所以在第一波調查中，兩校共有50多個學生與他一直行動。同時，他以「失落社會檔案室」之名開辦攝影工作坊，也帶來包括校外攝影素人在內的眾人士共同參與前後兩波的深入調查。在第二波調查中，共有70多名學生一同參與。

《海市蜃樓》和《海市蜃樓II》兩書，共計收入包括已經列入「活化」計畫在內的近260家「公共閒置設施」。這個踏查行動，其調查對象相當廣泛。從文體設施到包括各種性質的公有資產設施，甚至包括了台灣軍方擁有的閒置軍事設施。據媒體報導，在第二波調查中，「姚團隊」竟然發現台灣軍方閒置的營地多達372處。

如此興師動眾地踏查，目的或者說問題意識是什麼？正如姚瑞中在《海市蜃樓》序言中所提出的：「究竟什麼是「蚊子館」？「蚊子館」與「閒置公共設施」的差別在那裡？全台灣到底有多少座「蚊子館」？又是如何形成的？每一座「蚊子館」只是個案，還是暗示著不同產業的結構性問題？或者，「蚊子館」是整個社會體制共謀下的產物？」（《海市蜃樓》，頁8）他說，通過「破壞性的創造」來對付權力的「創造性的破壞」，是他發起這個行動的目的。

讓我們看看「姚團隊」如何調查，並如何呈現調查結果。以《海市蜃樓》為例，此書分為兩個篇章，第一篇為「完全閒置、低度使用或延宕開發之公共設施」，其中包括了交通建設、工商園區、文教設施、體育場館、社會福利設施暨活動中心、產業展售場館暨直銷中心、辦公廳舍、市場、工程設施、觀光遊息設施和休閒育樂設施。第二篇則為已解除列管並進行活化之公共設施。

「姚團隊」師生的踏查，一般按照以下基本格式來展示閒置設施的狀態：設施地址、主管機關、管理機關、建造日期、建造經費，以及相關文字描述並且配以多幅拍攝自現場的照片。

以「馬祖東引志清圖書館」為例，圖片為鞠晴和呂宛書拍攝，描述文字為呂宛書撰寫：在馬祖東引的中正堂旁，意外發現一棟廢棄的二層樓建築，上頭用鍍金色字體寫著『志清圖書館』。但這個放置圖書的地方外觀看起來破舊不堪，好似已被遺忘已久。門窗是老舊的黃色塑

膠片，但都似乎被鎖上無法推開。透過裂縫看進去，發現裡頭竟然是空空如也，地上佈滿厚重灰塵。看不出有什麼隔間差異，有些地方則像是堆了建料用材。經調查得知，志清圖書館的命名乃因蔣中正字介石、學名志清而來。該館是於1985年12月8日，由東引指揮部花費新台幣500萬元所建，並選在隔年10月31日啟用，當天為蔣中正誕辰紀念日。館內原本設有兩間書報閱覽室、三間視聽室、會議室兼展覽室、書庫、貴賓室與管理室各一間，並會訂閱雜誌與報紙供島上居民使用，據資料指出，在2000年時，館藏圖書甚至高達數萬本，以政治、思想、文藝、勵志文學等書籍為主，並訂閱天下、財訊、時報週刊等19種雜誌，以及青年日報、民生報、忠誠報以東湧日報等4份報紙，采開放式供全島軍民閱讀。但迄今過了10年，我們來到此處卻看到這般破損，那些文字記憶都去哪兒呢？在馬祖採訪過程中遇見了不少當地居民，除了略為驚訝的看著我們一身相機的裝備，也好奇我們在這裡的目的。簡單攀談之中，我們慢慢了解到這座島嶼的處境，除了缺乏當地特色的產業，無法擁有額外的受益之外，中央給予的經費不足，也都導致了這裡現今觀光孤立的悲哀。此外，還有更多的是銜接各島嶼的交通問題和戰地遺跡留存的爭議，其實當地人都明白這片土地的生存危機，也略知政府私下的利益糾葛導致的政策錯誤，但卻又無力駁回，只能搖頭接受。我最無法接受的就是這種荒謬，原來。『蚊子館』只是其中一種醜陋的方式存在，還有更多失敗的政策在運轉，然後橫屍遍野。這些建物的樣貌，在看似平和且靜默的狀態裏，其實都存在著吊詭的因果關係，至今仍懸而未解。

也許這篇文字（已經屬於最短的）的引用有點長，但如果有省略的話也許會引起對於調查的曲解，因此希望通過完整的文本呈示令讀者看到，學生們的調查並不全都是火力全開的質問與憤怒，而是包含有對於身處其中的居民的充分理解與同情。

《海市蜃樓》出版後社會反響熱烈，第一版1,500冊很快售罄，出版社迅即加印500冊以應需求。《海市蜃樓II》則以2,000冊起印。在台灣，非暢銷類圖書能夠達到這個印量當屬不易，同時也說明公眾對於這個話題的關注程度較高。

「蚊子館踏查行動」也驚動了台灣的領導高層，副總統蕭萬長還與姚瑞中通電話表示關切。2010年10月8日，行政院長吳敦義於《海市蜃樓》出版後迅速約見姚瑞中向他「請益」。在見面時，姚瑞中建議當局不妨「將閒置公共空間釋放給民間非營利團體經營」，吳敦義則「責成工程會要拆除工程品質有問題、待報廢的工程，並與文建會及地方合作，對閒置空間進行更有

效活化。」（《聯合報》，2010年10月9日）這個踏查行動給主管部門文化建設委員會造成壓力。主任委員（此人後來因為音樂劇《夢想家》事件下台）親自登門姚瑞中工作室舉行座談。雙方如此來來往往，頗為熱鬧。雖然所謂「真理越辯越明」的理想未必能夠達成，但或許漁翁得利的會是關心自己「血稅」用於何方的納稅人大眾。本文之所以在此提及當局的反應，不是要炫耀此行動有高層領導關注是多麼光榮，而是要強調，這個行動給領導者造成切實的壓力，而姚瑞中則清醒地認識到，文化或藝術不該被政客拿來當幌子，不該服務政治或財團，他只是本著公民立場來調查台灣公共資源的濫用與爛用問題，至於政客們如何聞雞起舞，並不在他的預想、期待與把控之中。

以台灣現有兩黨制政治生態，藝術家針對社會議題的創作表達，可能會獲得相較於一黨專制時期更多的重視，這包括朝野兩黨與媒體的反應。若其中一方無視、打壓藝術家，在野一方將可能藉此發聲、做文章，姑且不論這樣的發聲是否動機單純，但議題的能見度就可以直線上升，使包括媒體在內的公眾介入的可能性提升。如此，藝術家提出的問題就更有可能獲得解決。

這個踏查行動，挑戰了台灣社會的公共空間政治，這些公共設施的興建，不僅涉及文化與經濟事業，也突顯了公共服務與管理的品質與效能，更與社會監督與管理有關。「姚團隊」的出手令許多問題浮出水面，其通過出版及大型展覽（例如台北雙年展等）的嚴肅呈示，令台灣公眾赫然發現在自己身邊，原來有這麼多沉睡不醒的「睡美人」。這個行動當然也獲得台灣知識界人士的強烈迴響，在《海市蜃樓II》中，南方朔、張鐵志、彭明輝、黃瑞茂、龔卓軍、張美陵等人也都毅然撰文給予支持。

台灣學者呂佩怡指出，「蚊子館踏查行動」包含兩個層次的批判意義：第一個層次是對民主制度的批判；另一個層次則是對準教育體制的僵化（《海市蜃樓II》，頁52）。的確，這個行動除了給台灣社會帶來震動之外，他的教學方式也令藝術系的學生們透過田野調查而獲益良多。「在這個以獨立學習為主的調查案中，學生們的學習範疇擴大，學習到田野外拍、跨領域視點，資料收集、田野調查（明查暗訪）、發現與指認問題、與陌生人攀談（演技訓練）、翻牆（體力訓練）、追新聞（狗仔隊精神）、專題安排、新聞采寫、編輯出版、布展、與政治人物會面、到接受媒體採訪等（《海市蜃樓II》，頁54）。」

當代藝術喜歡說「參與」，但真正的參與既是在作品的製作階段，也是在作品的觀看階段。片面強調在觀看階段的參與而忽視、甚至排除製作階段的參與可能性，無異於繼續製造與變相維護藝術家神話。像這樣的師生合同創作，是在製作階段就吸納眾人參與的當代藝術，雖然可能會稀釋掉藝術家的署名權，甚至令其失效，進而影響藝術家的市場效果，但如果有助於社會問題的視覺化，有助於展開某種公共對話，相信值得當代藝術家們嘗試並積累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努力將媒介素養教育與當代藝術結合的成功嘗試。

這場持續多年的抽樣踏查，還帶來其他附加效應。有一個學生說，本來與家長之間的溝通並不怎麼順暢，但為了順利進入有戒備的現場，父女喬裝為一對觀光客。她在父親的保護與掩護之下，大膽舉起照相機「自然地」拍攝下了調查目標。這麼一來，她既完成了作業，父親也瞭解了女兒的學習並且參與其中，親子關係也得以改變，更加了解彼此。

而這種田野式的走訪，也讓學生學會從某種視角（可能是批判的視角）來觀察、凝視家鄉。何謂鄉土？實際行走本鄉本土的地理實感，以及用身體經驗習得的空間記憶。當然，隨著參與這些活動，學生的社會意識也能隨之喚起並從中成長。

這種踏查行動也改變了師生的關係。姚瑞中以前擅長單打獨鬥，經過持續的田野調查行動，現在的他宛如「孫悟空」，擁有數十個學生一起工作，他在訪談中提到，讓學生走訪各地，就如同攤開手掌一吹，幾十個「小孫悟空」奔向全台各地。而放出去，收回來，一起交流，一起完成項目的過程，也令師生各有所獲，且師生關係也更形密切。

姚瑞中欣慰地發現，原本十分擔心學生能否一起完成這項龐大的普查計畫，慢慢地，從匯整回來的報告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埋藏於年輕人心中的浪漫主義情懷，這裡所指的浪漫主義並非風花雪月的故事，而是對社會現實所興起改革的浪漫情操，它存在著某種尚未被社會體制抹滅的天真情懷，也代表著小蝦米可以團結起來對抗大鯨魚的可能途徑。藝術與社會的互動既是以社會為對象的考察，也包括作為社會一分子的藝術工作者自身的返身性瞭解。這個行動，其實也涉及到「藝術為何」、「藝術教育為何」、「藝術為何」以及「藝術教育為何」的問題。

攝影是一種表像的再表像化，盲信攝影所見，可能會導致對於現實的嚴重誤解。從攝影的角度

看，這個踏查行動也反省了攝影關注現實的能力與局限性，並為攝影的美學價值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攝影的視覺觀察記錄容易流於表面，因此文字的深度描述與基本資料的格式化標配，或可彌補表面化圖像的局限。這幾個方面的有機結合，加上充足的記錄樣本數，終於使得調查結果呈現出更高的可信度。

羅列與歸類是攝影所長。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說的「歸檔熱」（archive fever）也許是攝影與生俱來的獨擅勝場。羅列與歸檔的攝影方式，是攝影家先使其所要呈現的現實事象片斷化，然後再一次以特定的方式，大量的集中呈示這些片斷，為共性的東西的「現前」做好物質的準備。同時，羅列與歸類所帶來的巨大勞動量，使攝影家所要提示的事實變得更具權威性；勞動與攝影調查的關係也透過照片的數量而得以確保；照片數量的累積，進一步確保了質的權威性。當然，如果是沒有社會問題意識的簡單羅列，那麼即使大量羅列，也無法成為一種社會觀念的「現前」。顯然，羅列與歸類之前的社會問題意識才是攝影踏查有無社會性的關鍵。

在當代藝術以彩色攝影為主流的今日，整個調查堅持採用黑白影像，也許是某種特定的美學追求的堅持。在數碼時代，黑白影像成為學院攝影教學的內容，也因此獲得少數精英的地位加冕。也許，姚瑞中是為了強調一種嚴肅性與學術性才統一使用黑白影像，我沒有向他求證這個形式。此外，所有調查照片的視角皆十分平實，也不考究光影效果，形同素人照片，這些拍攝者顯然有意摒棄攝影美學的基本要求，不為瞬間、角度、光線等所左右。這種素人風格的追求，可能有「不想使攝影美學過份騷擾大眾」的考慮，目的是使調查結果能夠與大眾較為自然地對接。當然，我們可能面臨無法自我解套的吊詭：攝影作為一種與大眾走得最近的視覺樣式，其「美學」難道不是大眾的嗎？為了與大眾順利相處，還有什麼需要顧慮與調理的？

在社會轉型大致底定的台灣社會，藝術如何介入社會，也許更具有挑戰性。身處開放的現代公民社會中，藝術家是否應該有「社會意識」？什麼是包括藝術家在內的社會大眾共同關心的問題與共同利益？藝術家如果要有意見表達，該從何處切入？在台灣這樣已經實現民主轉型的社會，對於藝術家來說，發現社會問題、呈示問題真相的要求與技能也越來越高，如何提出與大眾切身利益相關的話題，也許端賴藝術家的「社會意識」之深淺了，而藝術家有沒有「公民意識」，也許是藝術家有否「社會意識」的前提之一。藝術介入社會的目的之一，是要能夠通過

藝術來喚醒、培育社會各成員的公民意識。「姚團隊」的這個「蚊子館踏查行動」，至少對於參與其中的前後數百位年輕學子來說，是一種公民意識的素質訓練與人格修煉。他們走入社會後，對於觀察社會現實、思考與監督社會公共事務時，想必會有自己的立場。光是從這一點來看，「教藝術」的姚瑞中就已經大大有功於社會了。

藝術團隊作為社會力量之一，其主動介入現實、銳意改變某種狀態、打破平衡，進而引起某種變化、促進某種「活化」，可能是今後世界各地社區藝術與社會藝術的重頭戲。「姚團隊」的努力給人們種種的鼓勵與想像，當然也有評論家如南方朔在《海市蜃樓II》中的專文〈必先有蟑螂，而後才有蚊子〉中進一步呼籲：公共工程及建築已必須徹底改革。由蚊子行為的氾濫顯示出蚊子背後必有蟑螂，這是司法檢調的事；由公共工程的亂花錢，圍標綁標及護航，顯示出公共工程的行政管理已必須做更透明化的改革。至於學術界與媒體界，面對這個問題，除了踏查留下見證外，可能必須做更多的追蹤調查，尋找出蚊子背後的蟑螂。（《海市蜃樓II》，頁17）。這樣的「蟑螂」，在中國稱作「碩鼠」。其實，南方朔是在說，當藝術先行一步，對於某種社會現象的表面徵候做出了排查與記錄之後，各種媒介以及社會各方是否應該及時跟進並展開更深入的調查？

據稱，中國目前進入美術館建設的大躍進時期，各地確實出現了以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之名，行好大喜「公」之實地濫建「蚊子館」的熱潮。在這種「熱潮」之中，藝術家們有沒有可能以對於權力的高度警惕，通過各自獨特的方式來努力確保公共決策過程不走過場，確保公共資源分配不被濫用？

我們已經看到了羅永進、楊鐵軍、白小刺們拍攝的行政大樓肖像，接下來，有沒有人可能參考姚瑞中式的藝術群眾運動，來拍拍中國的「蚊子館」以作警示？

本文原刊載於中國上海東方早報 2012/5